

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辨析 ——兼论容闳与孙中山之关系

刘玉全

容闳是近代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他 1872 年实施 120 名幼童留学美国的计划，开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培养出詹天佑、唐绍仪、梁诚等一批近代化政治、科技、外交人才，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清政府鉴于容闳对驻洋肄业局的贡献，大清驻美国公使馆的创建，由在国内任命的江苏五品候补道，升任为三品衔驻洋肄业局副委员，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副公使，（享受二品衔待遇）。改革开放以来，对容闳的研究日渐深入，有关容闳的史料不断有学者发掘、整理出来。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的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环节，但有学者在史证匮乏的情况下，却得出容闳在庚子年（1900 年）“开始明确支持革命”^①，的结论，“自立军失败后的容闳和孙中山以及革命的关系更密切”^②，“容闳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活动，并为之积极奔走，这是他走向民主革命的出发点”^③。这显然对容闳参加排满革命有催熟、拔高、提前的倾向。至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笔者将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 13 年之间的史料仔细梳理一遍，结论却不尽相同。

1900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西逃、东南互保章程签订、庚子勤王运动惨遭镇压，许许多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一年内突然爆发。在这风云变幻的岁月里，

① 网络版：http://21ccom.net/articles/ljsd/article_201001202500.html 雷颐：《容闳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② 容应英：《容星桥：容闳与孙中山的接触点》，载吴文莱等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 年 10 月版，第 714 页。

③ 陈志雄、罗建军：《容闳与辛亥革命》，载吴文莱等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 年 10 月版，第 628 页。

留学之父容闳的政治态度如何？考察容闳在这一年内，从上海到新加坡会晤康有为，返回香港秘密会见兴中会早期领袖谢瓚泰、杨衢云，尔后重返上海当选为中国国会会长，旋与孙中山、容星桥同船奔赴日本，被李鸿章、张之洞当作国事犯勾联会匪公开通缉。此后，容闳在港澳隐居，于1902年5月返美定居，经历了犹豫、彷徨、权衡乃至长时间的思考、观察，直到晚年（1909年），他才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义无反顾地帮助孙中山在美国筹措款项，不遗余力协助中山先生制定“中国红龙计划”。现将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的过程予以辨析，就教于方家。

一、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之史实

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转变历经13年，大致分作四个阶段。

（一）从1898年8月进京支持康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1898年底离京流亡到上海。

（二）从1898年底到1902年5月。这一阶段是容闳追随康梁筹划庚子勤王起义，失败后，回到美国隐居。

（三）1902年到1908年，在美国隐居，定稿《西学东渐记》。仍与康梁保持联系。

（四）1909年5月利用在美国的人脉关系，策划“中国红龙计划”，协助孙中山筹措款项，支持国内武装起义。

容闳1898年8月自上海与李提摩太共同进京，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戊戌政变突然爆发，康有为仓皇出逃，容闳与李提摩太多方设法营救梁启超脱险，是维新改革派的杰出人物，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容闳流亡到上海，隐居在英租界与康梁秘密书信联络，应该是1899年仲春季节。而恰恰是在1899年到1902年5月这一段风云际会的岁月，容闳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记载简略，仅简短说他被选为中国国会会长一职，至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却是只字未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文作进一步辨析。现在，先回顾容闳1899年到1902年5月在国内乃至港澳和东南亚一带的主要活动。

（一）容闳赴新加坡与康有为会面

容闳赴新加坡的时间应该是1900年3月份，此时的康有为正秘密隐居在

新加坡爱国华商丘菽园的寓所，汤申路恒春园的南华楼里策划庚子勤王起义。容闳此次来新加坡，是康有为要借重容闳的声望，邀约容闳与在檀香山的梁启超一起赴美筹措巨款，用于支持庚子勤王起义的。康有为曾吟诗记录下这次聚会：德星光怪聚星坡，中外歌诗慷慨多。合沓蛟龙会云气，共伤故国起山河。诗前有一小序：容纯甫观察、丘仙根总统、王晓沧广文来星坡，与林文庆议员并集南华楼，林君赠我西文诗，即席答之，并索邱王二子和作。丘逢甲当年才36岁，对72岁的容闳非常崇敬，曾写下热情洋溢的诗歌，赞颂容闳西行赴美，诗题是《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 即送西行》。丘逢甲的诗印证了容闳准备西行赴美，“西行更哭秦”说明容闳西行是求助于美国。显然，康有为在这次群英聚会中宣讲了他武装勤王，解救光绪帝的计划。按康有为的策划，他安排长江沿岸及两广同时大举，再派一支精兵北上，迎接光绪帝，拥帝自立。容闳西行的任务是协助梁启超到美国筹借一笔千万元巨款。就在等待梁启超在檀香山的西行信息这段空闲时间，容闳曾来到香港，拜会兴中会的密友谢瓚泰。

（二）容闳在香港的活动

根据谢瓚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记载：

1900年4月18日，杨衢云访我。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忌妒，我强烈建议推举容闳博士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杨衢云通知我，惠州运动的组织工作，正迅速而顺利的进行。^①

谢瓚泰是兴中会早期坚定的反清革命志士，他坚决拥护杨衢云为兴中会首领，对孙中山抱有成见。谢瓚泰当年才28岁，虽然很年轻，但他有着与容闳相同的西学背景，所以，1899年当容星桥介绍他与容闳相识，很快与容闳结为密友，并对容闳十分崇敬。从上述记载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联合与合作。显然是指兴中会革命党与维新派的联合与合作。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没有提到康梁。这说明虽然容闳支持康梁，但他并没有加入保皇会，显然谢瓚泰有意争取以容闳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兴中会革命党联合。因为从1898年底，谢瓚泰就曾与康有为联系过两派合作问题，包括以后的孙中山、杨衢云拜托日本社会活动家宫崎滔天等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多

^① 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468页。

次联系商谈两派合作，均因康有为固执成见、勤王迎帝无果而终。这时候，以孙中山为会长，吸收哥老会、三合会的兴汉会已经成立，迫使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一职，谢瓚泰虽然不赞成，但孤掌难鸣，他提出联合维新党，推举容闳为首领，是一种策略。二是说明到此时，容闳还不太了解孙中山，他问谢瓚泰：“我还没有见过孙逸仙博士。他有多大年纪？我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① 容闳在香港从谢瓚泰那里了解到的孙中山，仅此而已。

但后来容闳并没有西行赴美，原因主要是梁启超的赴美筹款计划受挫，一是当时清廷驻美使领馆官吏百般阻挠，美方不准梁启超登陆美国大陆，说是南亚正在流行瘟疫，不准黄种人下船上岸，再者梁启超当时用的日本人名字的护照，已经过期，更主要的原因是梁启超后来调查清楚，所谓的美国商人赫钦与美国国务卿是朋友，可说服国务院资助保皇会一千万，是个骗局，梁启超沮丧万分，西行计划搁浅。

（三）容闳回上海被选为国会会长

容闳从海外返回上海的准确时间，没有资料证明，但容闳在纪传体回忆录《西学东渐记》里有明确记载：“即在上海组织一会，名曰中国强学会（即中国国会），以讨论关于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予竟被选为第一任会长。”^② 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驻上海支部干事井上雅二1900年7月26日的日记：“汪康年、唐才常等一个月以前提出的所谓国会，今天终于在愚园召开了。出席者五十二人，均为民间人士。前驻美公使容闳为主席，严复为副主席，决定二十九日再次开会，但章程尚未制定。”^③ 当时上海民间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国国会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从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太子（大阿哥），其用意在于废黜光绪帝，引来各国公使的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对西方各国更加仇视，随后她对“扶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采取首鼠两端的摇摆政策，致使义和拳运动迅速蔓延，英法等国联军于7月14日攻陷天津，进军北京。7月24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等奏告“东南互保章程”。这种情况下，南方社会各界人士看得很清

① 网络版 <http://www.oklink.net/a/0203/0311/xsszs/013-01.html> 《细说孙中山》，李君如主编，任贵祥编选。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81页。

③ 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2009年10月版，第366页。

楚，如果西方联军端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政权将出现真空，所以，汇聚在上海的各派势力酝酿成立一替代清政府的议政机构，作为过渡。当时，除去南方各省督抚衙门外，康梁保皇会潜在势力很大，但康梁是清政府通缉的头号要犯，自然，康梁的核心人物都不能出面组织国会。其次是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革命党，也是清政府通缉的对象。而容闳既没有参加保皇会，也没有参加兴中会，而且容闳也曾在清政府体制内担任过驻外公使，回国后，清政府又曾任命他为“津镇铁路”总办，在当时上海社会各界属德高望重而又忠君爱国，这样，由容闳担任会长的中国国会，也得到了南方各省督抚衙门的默认。

根据容闳在新加坡与康有为的聚会，他知道康有为在两广和长江沿岸起兵勤王的计划，回到上海他与唐才常频繁接触，且担任国会会长，唐才常赴汉口举兵勤王起义，容闳也是知晓的。至于在香港与谢瓚泰、杨衢云的秘密接触，应该是奉康有为之命，试图说服杨衢云、谢瓚泰响应康梁的勤王起义计划。因为在这之前，杨衢云与康有为曾有过联系，康有为认为杨衢云比孙中山态度灵活，也比孙中山好控制。1900年之前的兴中会与保皇会联合之所以没有成功，主要是两派联合后的领导权问题。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容闳的香港之行，其实是为康有为当说客，试图说服杨衢云、谢瓚泰响应康有为的武力勤王计划。容闳这时的政治态度，与康梁极其接近，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多次赞颂道：“光绪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①看容闳对光绪帝的崇敬与康有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一时期，他始终同情支持康梁保皇救国行动，并没有明确支持孙中山的排满革命主张。说他这时期“开始明确支持革命”，与史实不符。那么，庚子勤王起义失败之后，容闳的政治态度如何？请看以下史料。

（四）容闳短暂的日本之行

据容应庾女士提供的资料，容闳与孙中山、容星桥1900年三人9月3日抵达长崎后，容闳单独行动，一个人投宿于库利夫旅馆。但是孙中山和容星桥在当天下午5时多到晚上9时半到旅馆与他密谈。4日孙中山和容星桥乘火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80页。

车前往东京前再度访问他。至于孙中山与容闳密谈的内容，无有记录。

容闳在长崎的活动，曾经与化名高德与高打（高山）乘坐法国船抵长崎的两名中国青年约会。9月4日容闳接受九州日之出新闻社的访问时，批评英国政府对清国的态度不明朗。同日晚上10时他收到上海来的暗号电报。5日和6日他为了购物和购船票各外出一次，7日6时30分坐船离开长崎赴香港。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容闳在日本长崎仅停留三天。如果说是逃亡，绝不会到日本三天就转往香港，与其这样，何如直接逃到香港。显然，容闳与孙中山同船赴日本，是负有使命的。但从这三天的行程与结果来看，容闳与孙中山之间没有达成一致。就像过去孙中山与康梁多次意欲联合，终因政治态度不同而夭折。至于那个化名高德的青年，其实就是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化名高打（高山）的青年是狄葆贤，这两人都是梁启超在创办湖南时务学堂里的弟子，也是庚子勤王起义的干将，后来均成为康梁保皇会的骨干分子。这时候，他俩倒是真正逃亡到日本的。在日本能与容闳联系上，更说明容闳与康梁掌控的自立会关系密切，只不过容闳与自立会武装起义的密切关系在当时是处于地下秘密状态的。

（五）1900年容闳与康梁及孙中山关系辨析

从现在发掘出来的史料来看，庚子勤王起义主持者唐才常的政治态度与康梁始终保持一致。梁启超1889年11月在日本送唐才常、林圭回国组织勤王起义时，曾在东京芝红叶馆设宴饯行，当时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都出席，孙中山还介绍汉口兴中会员容星桥给林圭，可以配合勤王起义。唐才常以上海为活动中心，与容闳交往密切。在1900年8月庚子勤王起义的前夜，梁启超与孙中山都秘密潜回上海，各自组织自己的党徒，利用唐才常武装勤王起义，在两广组织更大的武装暴动。孙中山8月22日在日本横滨出发前曾发表以下谈话：

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①

^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198页。

从孙中山以上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虽然没有与容闳见过面，但他知道容闳在上海被选举为中国国会会长，他接受了谢瓚泰的建议，提出由无党无派、在国内没有任何组织体系却德高望重的容闳，来担任改革派联合体的领袖，是孙中山的一个策略。另外，看孙中山使用的“政治改革”词汇，并没有说是勤王起义、或者武装革命等等，这说明孙中山在秘密组织武装暴动的时刻，也注意联合改革派推动“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实行。也证明，容闳当时并不是孙中山武装革命的同路人。然而8月22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唐才常为首的起义首领二十多人一举逮捕，23日就匆匆杀害。汉口兴中会员容星桥侥幸逃脱，逃往上海。按照容应庚女士的说法，容星桥逃到上海先投奔容闳，（不知史料依据出处）。容星桥在9月1日，与孙中山一起乘日本神户丸号邮轮逃亡日本。孙中山匆匆返回日本，是因为英国驻上海领事告知孙，英国和日本当局都支持张之洞镇压唐才常武装暴动，孙先生回到上海的消息也被东南督抚侦查到，为安全起见，劝孙赶快离开上海。容闳恰在同一天也乘坐神户丸前往日本。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容闳此行是仓皇逃亡日本，其实容闳此时根本没有必要逃亡。在前往日本的邮轮上，容闳与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有学者说是“奇遇”或者“巧遇”，并想象出容闳与孙中山在船上放谈革命：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我认为：这是容闳专门与孙中山一起“逃往”日本，并且负有劝说孙中山与康梁合作的使命。因为这时候，梁启超也潜伏在上海，他是8月19日从神户出发，到上海应该是21日，在上海虹口丰阳馆住了10天。容闳与梁启超的关系从感情上比康有为更融洽，他在檀香山等容闳共同赴美期间，在与康有为商量勤王起义的通信中，多次提到要发挥容闳的作用。在1902年5月容闳定居美国后，还曾经两次写信邀请梁启超赴美访问。梁启超在策划庚子勤王起义的同时，力主在广东发难，多次给康有为建议占领广东作为根据地。虽然现在没有史料证明，但根据当时的情景，我大胆推测，容闳在上海一定会与梁启超会面。在唐才常突然遇难这个重大打击下，孙中山与梁启超都会作出剧烈反应：孙中山积极组织惠州起义，梁启超则马上着手组织广东举事。这时期的容闳，当然以梁启超的马首是瞻。

再来看张之洞、李鸿章的动作，更有力证明，容闳的日本之行，决不是

仓皇逃亡，更非“开始明确支持革命”，而是奉梁启超之命劝说孙中山配合康梁在广东举事。但容闳显然不能说服孙中山，倒是孙中山劝容闳回到反满革命阵营中来。容闳后来的行动证明他这时并没有脱离康梁追随孙中山。

从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行动来分析，张之洞主要是在两湖及长江沿岸大肆逮捕会党匪众及保皇会党人，其恐怖势力并没有达到上海这个大都市，中国国会包括严复副会长及几十名会员，没有一个逃亡的。《张之洞于荫霖奏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拿解散折》奏称：“查蒋帼才匪单内系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龙头。”^① 张之洞对于上海国会成立的情况，早有耳目报知，其中国会会员陶森甲就是张之洞的心腹。所以他在同一奏折中替国会辩解道：“旋经查出，乃大逆康有为一人主使调度，其伙党分布各省，辗转煽惑。其巢穴在上海，于租界内设有国会总会，入会者亦不尽康党。”^② 另外，张之洞缴获的所有自立会匪徒名单中并没有容闳的名字，涉及容闳的，仅有一句：“并据唐才常供，上海国会总头目系广东人容闳。”^③ 而容闳任国会会长是公开的，世人皆知。张之洞这封审讯有关庚子勤王起义案件的奏折，是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1900年9月13日）。根据晚清信息传播途径与渠道，张之洞给朝廷上的奏折，除了皇帝与相关军机大臣，阅读奏折的人极少，传播范围很有限。所以，容闳9月1日在上海没有必要仓皇逃亡。值得注意的是，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在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1900年9月6日）发出《寄伦敦罗使并转江鄂督》电文：

前月大通、汉口唐才常等作乱事发，经刘、张二帅严办，起获军械、票据，直认康党不讳。中外共知，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伊、容闳同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材运入粤，若不严办，必为北方之续，有碍东南商务大局。请速密商英政府，电驰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以遏乱萌。中外同受其益，即电复。^④

9月6日，容闳正与孙中山“逃亡”在日本。李鸿章电文中，显然是指

① 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2009年10月版，第146页。

② 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2009年10月版，第146页。

③ 杜迈之等编：《自立会史料》，岳麓书社，2009年10月版，第146页。

④ 邱迎春等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1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42页。

是在汉口捕杀唐才常之后，康梁准备在广东举事的情形。电报中提到的名字除“暗结广东著匪区新及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合各省会匪”外，其余何连旺、容闳等八人皆是康梁在港澳的骨干，这说明容闳在庚子勤王起义前后，一直参与康梁在广州准备举事的活动。

剿灭土匪，安靖地方，是李鸿章的强项，早在1900年初，他就成立缉捕总局，并派员分兵五路，在粤省为会办缉捕之所。对以区新为首的匪徒进行毁灭性打击。对康梁的保皇会，李鸿章当时采取了观望态度，9月6日他要求驻英公使罗丰禄“请速密商英政府，电驰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开始对保皇会的骨干下手，也是认为时机成熟，配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捕杀长江沿岸自立会首领的行动。李鸿章的电文公开点容闳的名字，并且分送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传播范围虽然有所扩大，但当时容闳不可能知道。

基于以上历史文献，充分证明容闳9月1日并非与孙中山一起逃亡日本。真正给容闳带来麻烦的是张之洞公开通缉容闳，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1900年10月3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二十收录有《查拿自立会匪示》，其中有容闳的名字，罪名是李鸿章所定的：查出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容闳等勾结会匪。私运外洋军火，图扰乱三江、两湖、两广各省情形，大略相同。

考察容闳的一生，他始终不愿与土匪、强盗为伍，虽然他支持康梁、唐才常在两广及长江沿岸联合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匪，这些都是秘密地下工作，并且是打着勤王保皇旗号进行的。容闳出身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生长在南中国海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环境中，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忠君爱国意识深入骨髓，为官做大事的观念很重。他1900年公开的身份是国会会长，官场中人则称呼他为“容道”，这是他的官衔，江苏候补道，相当于现在的市地级官职。驻洋肄业局副委员与驻美日秘三国副公使是差使，差使早撤，但容闳的江苏候补道始终没有被清廷撤职。而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回忆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直到1900年容闳对孙中山的认识，基本上如孙中山上文所写。但因为张之洞的公开通缉，容闳在国内一度无法安身，他的声誉也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他

对张之洞心生怨恨，非常反感。行文至此，我们回顾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均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包括慈禧太后、光绪帝也都一一评价，唯独对孙中山与他领导的排满革命运动，只字未提。因为《西学东渐记》是1909年在美国出版，完稿应该是在1908年或者稍晚时间，说明在《西学东渐记》出版之前，容闳对孙中山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或者说有所忌讳。

容闳从日本返回香港后，梁启超也在香港。由于李鸿章还没有北上议和，仍坐镇两广，防范严密，康梁始终不敢在广东举事，以梁启超在9月下旬离开香港赴新加坡会晤康有为为标志，康梁在国内武装勤王活动，也终于销声匿迹。疾风识劲草，意志坚定的孙中山在日本与容闳分手后，立即奔赴台湾，试图取得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实施惠州起义，目的是在广东乃至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国，作为反满革命根据地。他在台湾期间曾给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写过一封信：

弟意以杨君文优当财政，李君伯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①

信中的何、容，是指何启与容闳，意思是华南共和政府成立后，外交事务由何启与容闳负责。纵观全信与华南政府的人事蓝图来看，孙中山当时还没有历练为成熟的政治家，其实力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更不允许孙中山成立华南共和政府。而惠州起义也因为军械等准备未绪，依靠的外援完全落空，是导致这次起义很快就失败的直接原因。对于孙中山在华南共和政府安排的职位，像让盛宣怀主持内政，盛宣怀根本就不会同意，而容闳知道华南共和政府是虚无缥缈的蓝图，也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所以，这不能作为容闳开始追随孙中山排满革命的依据。至于“1901年春容闳造访台湾，谒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很可能与前一年9月孙中山会晤儿玉商讨购买军火事有关连”。为了论证容闳此时追随孙中山排满革命，这样的揣测，已经近似于主观臆断了。因为早在1900年9月29日，日本政府于孙中山抵台后的第二天，就以“有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202页。

碍外交”为由指令儿玉：“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必须严格阻止我国人援助其事”，^①并于10月初禁止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嫌疑人平山周、福本诚等45人在中国登陆。1900年10月中旬，以郑士良为首的起义军与清军苦战之时，日本政府实行了改组，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重申“既不许儿玉协助中国革命，又不许日本武官投效于中国革命军，并禁止军械出口”。^②在这样的形式下，1901年春容闳游历台湾期间，虽然受到儿玉的尊敬与款待，并邀请容闳一同赴日拜见天皇，但容闳绝不可能与台湾总督儿玉商量购买军火，搞武装起义。躲避清政府搜捕风头，是容闳游历台湾的目的，《西学东渐记》中已经有所透露。

（六）关于容闳系的评价

从台湾游历回到香港，容闳曾经为营救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给香港总督写信求助，时间是1901年8月15日。同日，容闳给经元善写了封信，对于了解容闳此时的政治态度及思想情绪很有帮助：“仆本庸才，齿逾古稀，致君乏术，救民无权，惟留此一腔热血漾胸。”^③1901年8月，支持义和团的顽固派载漪、刚毅等已被清洗、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回京日期确定、《辛丑条约》底稿也已议定，清廷的新政变法诏书已昭告世人。中国动荡一年多的政局开始稳定，清廷对康梁的搜捕力度减缓，反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加大搜捕力度，孙中山只得潜往日本待机而动。容闳既没有追随康梁远走海外，更没有与孙中山保持密切关系，而是隐居在港澳作新的打算。从容闳给经元善的信可以感受到他此时心境：“间尝论中国之大患，固不在于喜新，亦不在于守旧，独患其不新不旧，可新可旧。非但新旧相攻，抑且新旧自攻。积弱不振之原因实由此辈乡愚，行同鬼域所酿成，遂有如今之一日也，悲夫！仆与公异流同源，故不禁忧愤交加，忘其言之急烈。”^④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容闳对于中国当时的新派与旧派均感失望，不但“新旧相攻”，并且新旧也各自互相攻击。且不说清廷内部自相残杀，而康梁与孙中山也互相攻击，引起容闳的悲愤与失望。这说明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容闳对政治感到厌倦，萌生退隐

①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6—247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页。

③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6页。

④ 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6页。

美国的念头。而“仆与公异流同源”充分说明容闳与经元善的政治态度与思想体系属于一派。1902年5月16日容闳与康有为的弟子谭良夫妇乘“盖尔号”邮轮从香港赴美，70多岁的容闳终于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祖国，远赴美国隐居。

近代史研究先贤范文澜先生曾对维新派做过分析与评价，鉴于当时史料匮乏，范先生的分析与评价还处于粗线条式，但他敏锐地提出维新派中有一个“容闳系”，回顾容闳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勤王起义这一段的史实，“容闳系”的提出，是有史料依据的。以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容闳系”应该包括汪康年、黄遵宪、郑观应、经元善、严复、丘逢甲等人物。“容闳系”并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而是思想体系与政治态度基本相同的广泛概念。中国国会是这一派系短暂而又松散的组织形式，但因中国国会鱼龙混杂，很快分化化解，不久便被清廷取缔。这一派系，在庚子勤王起义前后这段风云突变的岁月里，是不会支持孙中山排满革命。

相比较来说，容闳与兴中会革命党的杨衢云、谢瓚泰私人关系更加密切。1901年8月，容闳与谢瓚泰在香港共同营救过经元善。据冯自由《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记载：“谢于己亥冬已介绍杨衢云与容闳会晤。嗣杨为清廷所害。遂有拥容为首领之意。盖谢于己亥杨衢云势迫辞职事件。意极不满。至是乃向容历陈洪全福、李纪堂、谋在广州发难之种种计划。容极首肯。允至美后尽力相助。旋于是年十一月渡美。”^①以谢瓚泰父子为主谋在广州举行大明顺天国起义，没有给孙中山汇报，或许是谢瓚泰有意避开孙中山的领导，却着意拥戴容闳为大明顺天国总统。这说明谢瓚泰等对孙中山意见很大，拥戴容闳也说明容闳与谢瓚泰一派兴中会员关系密切。以容闳的丰富阅历，耳闻目睹了庚子勤王起义、惠州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对洪全福这些江湖会党的武装暴动，容闳口头答应。从1901年8月份谢瓚泰、李纪堂、洪全福等在香港、澳门、广州斥巨资广泛动员，冯自由说是1901年十一月容闳渡美，其实容闳是1902年5月16日才从香港出发的。从1901年8月到1902年5月，这八九个月的时间，正是大明顺天国起义准备的紧张时刻，但始终看不到容闳的影子参与其中。容闳到美国哈得福市定居后，最初仍然与哈得福市保皇会头目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上海书店，1997年2月版，第120页。

徐勤往来密切。大明顺天国起义定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1903年1月25日至28日),要拥戴容闳为大明顺天国总统,但容闳此时却在美国定居。这些江湖会党要借用容闳的名声,容闳鉴于与谢瓚泰的亲密关系,只得让他们借用,成功了是名义总统,不成功,容闳在美国,清政府当局也无可奈何。因此,我认为“自立军失败后的容闳和孙中山以及革命的关系更密切”^①,这一结论缺乏历史依据。

二、定居美国积极支持孙中山武装起义

容闳在美国定居后,开始回忆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并撰写回忆录。而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美洲展开了第一次大论战。容闳没有参与革命与保皇的论战,可他继续与康有为、梁启超保持着友好往来关系。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来到美国的旧金山,主要是与当地的保皇派争夺舆论阵地,对被保皇党控制的《大同日报》进行了彻底改组,改由革命党人刘成禺担任主编,从此,《大同日报》开始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革命理论。但没有资料证实容闳此时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任何表示。反倒是梁启超1903年访美,康有为1905年访美,容闳均以朋友身份热情接待。

1909年发生的康有为保皇党刺杀维新志士刘士骥一案,使容闳彻底与康有为决裂,这与容闳安排其长子容觐彤回国有关。1909年夏,容闳派长子容觐彤随同前来美洲向华侨招股开矿的广西道员刘士骥回国。刘士骥早年也是维新志士,戊戌变法时与康有为一起为国事奔走。1908年保皇党派叶惠伯、欧榘甲、刘汝兴、梁少闲、刘义任五人与刘士骥一块到美洲招股,由保皇会拨款7000元作为他们的路费与活动经费。刘士骥等在美洲招股大获成功,募得股金300万,并聘请矿物技师容觐彤回广西开办矿务。康有为指示大弟子徐勤要求刘士骥留下一半股金用于保皇会办实业,被刘士骥一口回绝。康有为、徐勤派人于1909年5月27日暗杀了刘士骥。这一案件,导致了容闳与康有为的彻底决裂,从此分道扬镳,全身心投入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来,

^① 容应英:《容星桥:容闳与孙中山的接触点》,载吴文莱等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14页。

并将他在美国结识的同情中国革命的金融界人士布司、艾伦和军事理论家荷马·李介绍给中山先生。当时以荷马·李、布司等发起组成一个援华的反清军事作战计划，拟由美国投资者和中国的改革派组成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协调行动，布司与荷马·李负责向美国银行家商量借款，容闳则负责邀请孙中山合作实现这一计划。

美国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收藏有这时期容闳与布司、荷马·李往来信函 27 件，孙中山与布司、荷马·李往来信件 20 余件，布司、艾伦、荷马·李往来信件几十封。容闳写信时间迄于 1908 年 10 月 9 日，止于 1910 年 11 月 10 日。这批信函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以及日益变得明确的“中国红龙计划”。“中国红龙计划”，可以说是容闳竭力促成的结果，因为种种原因虽然没能够实现，充分证明容闳晚年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全力支持，抱有莫大希望。

自 1911 年秋后，容闳病重不起，他嘱咐两个儿子回中国，帮助孙中山建设中华民国。1912 年 4 月 21 日，容闳在纽约家中悄悄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 84 岁。

三、简短的结语

本文通过回顾容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转变之史实，论证容闳在自立军失败后并没有和孙中山以及革命的关系更密切。容闳当时陷入痛苦的思索与迷茫之中，产生退隐美国的念头。我以为，这丝毫不影响容闳在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从 1900 年到 1909 年，经过漫长的岁月考验及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即将成功之时，容闳终于认识到康有为的保守落后，而孙中山是挽救时局的领袖，这时他才开始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并在美国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制定为国内武装起义筹措巨款的“中国红龙计划”，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对国内革命志士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与支持作用。容闳仍不失为与时俱进的革命战士，虽然他已进入暮年。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拔高、不贬低，不因个人的爱憎而主观臆断，不因时代潮流的影响而随波逐流，包括评价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均应如是。

刘玉全 河南学者